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九期
2013年11月　　頁83~118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3.79.03

「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

顏　健　富**

摘　要

本文觀察「身體」與「國體」的比附架構在晚清小說敘事中的發生。首先，本文探討晚清作者透過「身體」的分裂、拉扯、非人化等筆調，銘刻近代中國在「進化」話語下的「弱肉強食」，構築一具有視覺意象的「身體時局圖」，反映四分五裂、積弱不振的國體；接著，本文指出晚清「新小說」文體預設的「改革」視野，結合各種醫病言說、醫學原理、器物發明等，將「病體中國」推到手術床上接受診斷、治療，開拓嶄新的「醫病」想像，早於五四之前便實踐「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敘事；最後，本文指出晚清作者不止於疾病的治療，更進一步以極大化的「對比」架構如「新與舊」、「古與今」、「強與弱」、「睡與醒」，替人物淬魂鍊體，重振國體之威，構成「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此由身體時局圖、小說診斷學與魂體對比法共構的討論脈絡，將反映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

關鍵詞：身體　國體　醫病　小說　晚清

101.07.15 收稿，102.02.23 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提供審查意見，讓筆者得以調整若干細節與結構，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身體／國體觀

「身體」既是「存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也是「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且「在各文化和歷史階段中有不同的概念」。[1]就近代中國「身體」而言，論者已提及「身體」被置入由族到國或由國到族的認同與主權建構過程，國力建構依賴的是身體的存在與其強弱特質，於是開啟各種操控身體的機制，如禮儀教化、軍事訓練、流行病和公共衛生控制、人口統制及知識的傳布，將「身體」國家化、使命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等。[2]由此可見，「身體」乃是文化政治展演的重要場合，並非絕對自發、天生或自主，而是受到政經、軍事、社會、文化的形塑。此如康有為與梁啟超以國族興亡做為解放纏足、強身健體的考量：「歐美之人，體質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尪弱纖僂，為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3]

當晚清時人將身體改造與國家生存緊密聯繫時，出現大量以「身體」隱喻「國體」的論述模式，如劉紀蕙從「國家生理學」的視角指出時人或將「國家」視為「自然的有機體」，或指出「個人」為「社會的細胞」，或將「政府」喻為身體的「中樞器官」，「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被透過生理化想像的倫理模式所結構」。[4]無論人體的四肢五臟、筋脈血輪、體格魂魄都可做為「國體」

1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1;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4), p.31.

2 此論述可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作者從及政治、經濟、思想、教育、公共衛生等各種細微管道探及中國近現代「身體」的生成與建構。

3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收入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 12 集(台北：宏業書局，1976)，頁 41；梁啟超，《新民說．論尚武》，《梁啟超全集》第 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713。

4 劉紀蕙從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國的「理論旅行」路線，觀察影響近代中日主體論述的德國佛朗茲(Gustav Adolph Constantin Frantz)「國家生理學」(Physiologic der Staaten)時指出：「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被透過生理化想像的倫理模式所結構，而構成了個體成為國民／主體的首要條件。從佛朗茲、森有禮、柏格曼到樋口勘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同樣的文字反覆流通於他們的作品之中。個體依照國家有機體的原則治理自己，這是一種倫理主體的話語，此話語模式在國家體制之下透過倫理學以及教育制度被構成，而逐漸深化與擴展。」劉紀蕙，〈內與外的拓樸關係〉，《心

的投射，如嚴復與梁啟超所言：「夫一國猶之一身也，脈絡貫通，官體相救……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5]於此身體／國體視野中，時人掀開形象化的譬喻，如「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6]更常見的是以「病體」投射羸弱不振的國勢：「黃種病，病得迷癡，……得了期陰邪內伏傷元氣四肢麻木，真係針灸難施。」[7]在改革視域中催生的晚清「小說界革命」亦參與其中，或以「弱肉強食」的圖像喻示中國的「瓜分慘禍」，或以「病體治療」的敘事尋找拯救「病夫／國」之方，或以「淬魂鍊體」的方式搬演「新中國未來記」（詳後述）。

這些涉及不同層面的「身體」隱喻，或凸顯國家遭遇或反映治療期許，殊途同歸，共構成身體／國體的新視角。此「國體」牽涉到不同於傳統「家國同構」的「國家」觀：從「天下觀」的「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轉向近代意義的「國」與「國」的概念，「國家被定義為個人權利之集合，即國家主權是個人權利讓渡的產物。」[8]為傳達「國體」際遇，晚清小說作者調動各種「身體」意象，包括傳統的「形體魂魄」與近代耶穌會士帶入的「全體新論」、「靈

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頁 66。

5 嚴復，〈原強〉，收入王栻編，《嚴復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9、26；梁啟超，《新民說．敘論》，《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655。

6 梁啟超，《新民說．敘論》，同上註。

7 珠海夢餘生，〈粵謳新解心五章．黃種病〉，《新小說》第 2 卷第 4 期（1905 年 5 月），頁 1。

8 傳統的「國家」觀乃是「家國同構體」，是一沒有固定邊界或民族為依托的集合。「國」以皇帝家族為政治核心，行政是中央集權政府，而「家」及宗族是最廣泛的社會基層組織或基本單元。只要某一地區接受儒家倫理，宗族成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納入「家國同構」的政治共同體。如此的「國家」觀念在晚清發生轉變，「二十世紀頭十五年，是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勃興、學習西方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時期。也就是說，繼萬國觀去中心化後，清廷確立了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儒家倫理退到私領域，不能規範公共領域的社會制度，當然也不再和世界秩序有關，它只能作為中國人的認同符號。這時，在公共領域，國家被定義為個人權利之集合，即國家主權是個人權利讓渡的產物，儒家倫理和文化認同規定了讓渡權利共同體的規模，該共同體就是中國民族。事實上，引進民族主義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正是在這一時段（1900-1915 年）發生的。」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 225、238。

魂說」等，[9]從形體、魂魄、筋脈到器官等都可編成「國體」的指涉。論者確已從思想、歷史材料關注到近代身體／國體的議題，可是尚未探及彼時小說界對此視角的形塑。晚清作者夾雜著虛實交錯的想像，在議論、敘事、人物、對白、場景、意象的佈局中拓展生動鮮明的視野，乃是值得關注的對象。可惜的是，這些早在魯迅小說前便出現的書寫備受忽略，導致文學史過於放大魯迅於此議題上做為「從頭說起」的意義。[10]

本文意不在於社會學的「身體／國體」生成視角，卻探向小說文體如何透過各種敘事元素將「身體」變為一敞開的空間，經由操作、製造、暴露而排列成一無盡延伸的「國體」展示？在論文結構上，本文首先探討晚清作者如何透過「身體」的分裂、拉扯、非人化等筆調，銘刻近代中國在「進化」話語下的「身體時局圖」？接著，本文指出晚清「新小說」文體預設的「改革」視野，結合各種醫病言說、醫學原理、器物發明等，將「病體中國」推到手術床上接受診斷、治療，開拓嶄新的「醫病」想像，早於五四前便實踐「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敘事；最後，本文指出晚清作者更進一步以極大化的「對比」架構如「新與舊」、「古與今」、「強與弱」、「睡與醒」等替人物淬魂鍊體，重振國體之威，構成「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

二、身體時局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在瓜分慘禍屢傳的19、20世紀之交，晚清文化界輾轉流傳著訴諸時局的〈時

9 關於傳統的形體、精氣、魂魄等論述可見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第2卷第3期（1991年9月），頁1-65；關於近代耶穌會士帶入的《全體新論》與靈魂說，可見祝平一，〈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第7卷第2期（1996年6月），頁47-98；就晚清時人的身體論述而言，以上兩者並非涇渭分明，可能相互結合，如吳趼人〈還我魂靈記〉調動基督教的「靈魂說」與中國傳統的「精、氣、神」與「魂魄」等觀念，論述過程中又將傳統居於主要位置的「心」轉移到生理學脈絡的「腦」。此方面之研究可見張寧，〈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頁36-37。

10 魯迅做為身體／國體的討論焦點饒具意義，無論其敘事／敘述／論述都高度將「身體」置入「國體」的脈絡，塑造砍頭、昏睡／清醒、活死屍的囚徒、鐵屋子、庸眾／獨異個人等都敘事。不過，魯迅對身體／國體的視野並非憑空而出，卻是根基於一個時代的論述結構、方法與視野。事實上，晚清小說已拓展一系列有關砍頭、昏睡／清醒、鐵屋子、庸眾／獨異個人等敘事，投射出身體／國體觀。

局全圖〉，[11]在中國地圖上置入狼虎豺豹、熊犬蛤鷹等，其策略甚明，以盤據在中國領土四周的凶猛動物彰顯列強對中國的控制，栩栩如生地道出近代中國的遭遇。除漫畫版的「時局圖」外，時人亦以文字傳達各種豆剖瓜分的憂患，如1904年，刊登於《安徽俗話報》第2期的詩歌〈招國魂：哀軍人之不振也〉所寫：「東有狼兮西有虎，南有矢兮北有弩。我國魂兮其歸來，國無魂兮將無主」；[12]石臞山民刊登於《月月小說》的〈新乾坤〉將中國影射為「長睡洲」、「大夢國」，四周置上名為「虎、豹、獅、象、熊、狼、鱷、鯨」的國家。[13]無論是漫畫、詩歌或小說都分享「弱肉強食」的結構，在在宣告中國傳統「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永恆秩序或道德尊卑等級的破滅，[14]隱喻國體的「身體」轉而被置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話語。[15]本文欲聚焦討論的是：一旦作者以「身體」演繹「國體」時，小說敘事與文學隱喻功能如何轉化與渲染「進化論」話語下的國體遭遇？作者如何透過「身體」的拉扯、割裂、非人化等操作具有視覺意象的「身體時局圖」？

小說敘事具有的人物、情節、場景、對話、意象等元素，可讓作者將「身

11 關於近現代〈時局全圖〉的各種版本及演變，可見魯道夫（Rudolf G. Wagner），〈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頁 3-44。

12 佚名，〈招國魂：哀軍人之不振也〉，《安徽俗話報》第 2 期（1904 年 5 月），頁 35。

13 石臞山民，〈新乾坤〉，《月月小說》第 20 號（1908 年 9 月），頁 2。

14 此可參考金觀濤對於「天下觀」轉到「世界觀」的研究：「無論『天下』還是『萬國』，都和中國傳統『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永恆秩序相聯繫；而當國家不再有永恆的道德尊卑等級，由民族國家組成的整體一定是變動不已的，故取代天下和萬國觀的，是以『世界』命名、與『世紀』經常聯用的新社會組織藍圖。」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頁 240。

15 關於晚清的「進化論」，實是嚴復根據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 Huxley）於 1893 年發表的《進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和〈進化論與倫理導言〉有選擇性地譯介，融入達爾文《物種起源》、斯賓塞《綜合哲學》、馬爾薩斯《人口論》等學說，將原本生物遵守自然界的競爭法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置入「人種競爭」，引發中國人的強烈迴響。鄒振環，〈《天演論》：危機意識的產物〉，《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 118；關於「物競天擇」的內容如嚴復指出：「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搆，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嚴復，〈附：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 1 冊，頁 16。

體」變為一敞開的空間，經由操作、製造、暴露而排列成一無盡延伸的展示，承擔起近代種與種、國與國競爭架構下的「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愚者智役」等二元思維，傳達「進者存而傳焉，不進者病而亡焉」、「負者日退，而進者日昌」的教誨。[16]在時人結合憂患、哀嘆、警惕、批判的多重情感結構中，軀體、髮膚、精神猶如一展示的「身體」世界，按照作者支配性、剝奪性的剪裁，編列成為「國體」的指涉，成為一栩栩如生的「身體時局圖」。陳天華（1875-1905）刊登於《民報》第1至5、7至9號的〈獅子吼〉以寓言形式開場，安排名為「華人夢」的角色接獲俄羅斯佔據東三省、英國派兵艦到吳淞口的噩耗後，在衰敗荒蕪的場景騎馬逃跑，跌入「虎狼無數」的深溝，「小子比（彼）時魂飛天外，恰要走時，已被他們望見，飛奔前來，起頭想空手攔擋。不料已被抓倒在地，右臂已嚼上一口，痛入骨髓，長號一聲」。[17]此遭遇身體裂傷的經驗與反應，無不呈顯國體深陷泥沼的歷史困境，反映慘遭列強瓜分與魂飛魄散的國勢。

當「身體」成為詮釋「國體」的視角，晚清作者不止於將「身體」置入狼虎豺豹、熊犬蛤鷹的圍繞中，開拓更多的想像，其中之一便是昏沉倦怠的身體觀。朱光潛《文藝心理學》曾以「應用生物學」的「適者生存」原理揭示人體形態的標準：「健全是人體的常態，耳聾、口吃、面麻、頸腫、背駝、足跛等等都不是常態，所以顯得醜。一般生物的常態是生氣蓬勃，活潑靈巧。」[18]放到晚清的脈絡，恰可見作者以各種反常態、反健全或是反生氣蓬勃的「身體」傳達亡國滅種的憂患。1903年，署名「鴻都百鍊生」、「丹徒劉鐵雲」刊於《繡像小說》，後改於《日日新聞》刊登的《老殘遊記》一開場便安排遊歷大江南北，搖串鈴的江湖醫生——老殘來到山東，目睹大戶人家黃瑞和染上怪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黃瑞和」之命名指向「黃河」，「每年總要潰幾個」的潰爛窟窿可視為國體障礙或是屢遭踐踏的遭遇，必須嚴陣以待，否則便如小說第11回的補述：「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19]劉鶚以搖串鈴的「老殘」治療「黃瑞和」的潰爛之體置於卷首，實有宣告的意義，召喚自己治理「黃河」的記憶、使命、理念，反映其在不同階段透過工學／文學、幕

16 嚴復，《天演論．導言十五》，《嚴復集》第5冊，頁1351、1352。

17 過庭，〈獅子吼〉，《民報》第2號（1905年11月），第1回，頁4。

18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卷1，頁144。

19 劉鶚，《老殘遊記》，收入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第5冊（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第1回，頁2；第11回，頁113。

僚／小說家、公／私等場合拯救「中國」的心志，老殘治療黃瑞和之窟窿的敘事可視為劉鶚治理「黃河」的延續。[20]

「窟窿」、「潰」、「潰爛」、「怪病」乃是非「常態」、反「健全」的病體，「疾病將個人和社會植入一種特殊的、亦即不是一般通常的關係之中……介入個人和周圍世界之間本來很正常的關係之中」，[21]反映失序的機制。此如《女媧石》描寫「人民年災月難，得下軟骨證（症）」、《月球殖民地小說》致使「心房便漸漸縮小」的八股病，《新中國》的「迷迷糊糊，終日天昏地黑」的「沉睡不醒病」，[22]以各種民族病徵投射急遽變化的周遭世界與內憂外患的威脅。劉鶚鋪陳人物的「渾身潰爛」後轉到可與身體潰爛相呼應的夢境：「海中白浪如山」、「天上雲氣一片一片價疊起」、「風聲呼呼價響」烘托列強侵襲的局勢，隱喻中國的「破舊帆船」受到激烈的衝擊，被「浪花直灌進去」。[23]作者恰好藉由現實中會致命的窟窿與夢境中沉落的破船，演繹著近代國體在浪潮中載沉載浮乃至沉淪滅頂的際遇。

1904年，東海覺我（徐念慈，1875-1908）連載於《女子世界》第1至4期的〈情天債〉以痴呆倦怠的昏睡身體與屍首斷裂的慘景，彰顯國體遭遇。屬於「小說林」派的徐念慈，著有〈小說林緣起〉、〈余之小說觀〉、〈小說管窺錄〉等論及小說理論的文章，反映相當的美學自覺：「所謂小說者，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其最上乘者乎」，[24]修正了「新小說」派過於政治性的小說工

20 劉鶚熟習水利、天文、醫療、算術、樂律、詞章，1884 年，父親過世後，曾到淮安開設煙葉鋪、藥店，也到揚州、上海掛牌行醫。1888 年，劉鶚投效河南鄭州巡撫吳大澂幕下，成功解決黃河潰決的棘手問題。劉厚澤，〈劉鶚與「老殘遊記」〉，收入劉德隆等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 9。另，劉鶚之子劉大紳曾撰文指出「黃瑞和指黃河，因先君曾在河南山東辦理黃河工程，故以黃瑞和治病影射之。」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收入魏紹昌編，《老殘遊記資料》（上海：中華書局，1962），頁 63。

21 維拉．伯蘭特著，方維貴譯，〈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收入葉舒憲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267。

22 海天獨嘯子，《女媧石》，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25 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第 10 回，頁 496；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晚清小說大系》第 18 冊，第 12 回，頁 66；陸士諤《新中國》，《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58 冊，第 4 回，頁 480。

23 劉大紳分析「帆船」的隱喻：「喻中國；二十三四丈，喻行省數；管舵四人，喻軍機大臣人數；八桅喻行省總督人數。」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 63。

24 覺我，〈小說林緣起〉，《小說林》第 1 期（1907 年 2 月），頁 1。

具論。[25]就〈情天債〉的藝術美學而言，有得有失。最能實現美學效果的是小說第一回以超寫實筆調塑造的氣氛詭譎、背景模糊、荒廢衰敗的荒原。就「荒原」書寫而言，更為人知的是1921年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反映西方戰後文明危機和傳統價值失落的精神狀態。與艾略特同時代的美國詩人威廉斯（W. C. Williams）已指出〈荒原〉使得「我們的一切快樂終結了。它如一顆炸彈，摧毀我們的世界，使我們向未知領域的所有衝鋒都化為灰燼。」[26]早於〈荒原〉十七年，徐念慈在中國版的「荒原」投下一顆「終結快樂」的炸彈：近代中國文明的失序、政治的崩解、西潮的入侵而構成史無前例的「天崩地裂」！徐念慈將現實的創傷經驗轉化為小說中怵目驚心、迷離倘恍的夢境，安排一批陷入千古大夢的男男女女躺在荒原。敘事者對此荒原場景喃喃自語：「阿呀，這是什麼地方，為何荒廢得不成個樣子！阿呀，這是什麼人家，為何衰敗得不成個樣子！阿呀，這是什麼樣人，為何假痴假呆的躺在那裏，如醉如迷的睡在那裏！」急促的敘事句式、疑慮不安的語氣，渲染了敘事者面向時代的困惑與驚懼。持刀拿槍的兇徒暴客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殺的殺，刺的刺，亂砍的亂斬的一陣，血流滿地，可憐那些男女，從睡夢中，被人殺了連一個『冤』字也沒有喊得。」[27]此讓敘事者措手不及的「殺、刺、砍、斬」等砍伐動作，回應梁啟超的「斷、瘵、傷、涸」，反映四分五裂的身體／國體觀。

徐念慈在夢境中透過有意為之的變形、省略、替換等方式，勾勒現實中似曾相識的「驚悚」感，讓睡意朦朧、往下傾倒的「假癡假呆」、「如醉如迷」的身體——眼神空洞、體格羸弱、神情麻木，共構成「中國人」的標誌。小說名為「情天債」，實為「國族債」，鋪陳「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教誨：西方屠刀砍下中國人的頭顱——「颼」的一聲，「這樣霜鋒雪亮的刀早已怜怜悧悧把頭砍下，胸內熱血如放花一般直攛出來，濺了滿地」。作者刻意將「西方」置入雙重的位置：既是兇徒暴客又是啟蒙教誨者，對敘事者發話：此乃是「你們的祖國」、「睡久了，連自己國名也記不起」，「你方纔看見的那家便是國

25 「新小說」派如梁啟超、羅普、狄葆賢等人，以文學為政治啟蒙的工具，立意創作政治小說，也參與政治活動；「小說林」派如曾樸、徐念慈、黃人，是江蘇常熟人，自學外語，能古也能今，能翻譯也能創作，更重視美學。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8-19。

26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7), p. 174.

27 東海覺我，〈情天債〉，《女子世界》第 1 期（1904 年 1 月），第 1 回，頁 3、4。

中的寫真片了。」[28]此中國「寫真片」投射出民族身體：中國屍首沉浸在陰影中，頭顱落地、鮮血直竄，濃縮了中國屢遭瓜分的歷史進程，從鴉片戰爭、中法之戰、甲午之戰、八國聯軍到俄日之戰，中國無一不面臨割據領土、魂斷江山、屍首分裂的窘境。此結合神秘、詭異、污穢、斷裂的筆調醞釀出具有視覺意象的文字渲染力，可惜的是隨著人物的夢醒，超寫實的筆調轉而邏輯化的直白議論，作者夾敘夾議起「帝國第一女傑革命花蘇華夢」吸取夢中教訓而力挽狂瀾的豐功偉績，乃是配合刊登場地——丁初我、秋瑾編輯的《女子世界》標榜的「女性」主旨：「女子者，國民之母也」、「謂二十世紀中國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29]即或徐念慈比起「新小說」派更具美學自覺，可是在改革的熱潮中仍難以抵抗小說救國的誘惑，局限了其原可達到的美學成就。

〈情天債〉以昏迷身體表現積弱不振的國體，開拓鮮明的「昏睡者」形象，實具文學史意義。小說人物「橫七豎八，一無分別的睡著」，即或被呼喚，卻「翻個身依舊睡著的，有些睡夢中依舊囈語了幾句。最多的是，躺在那裏如死人一般不動的。」[30]此奄奄一息、昏睡倦怠的身體猶如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所謂的「敗壞徵象與徵候」：「精疲力竭、沉重、痴呆、倦怠，任何缺乏自由的表現，如抽搐或癱瘓，尤其屍體腐化的氣味、顏色、形態」。[31]不同於尼采訴諸「個人自由」的匱缺，晚清作者表現出因缺乏國權國勢而導致的「敗壞徵象」。放到晚清的文化脈絡，「昏睡」非止於生理狀態，常指向現實中昏睡於「世界」搖籃的中國的停滯、昏迷、蒙昧、落後、被動，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鋪寫「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鼾睡？……一國的人，多半還在睡夢裏頭，他還不知道有這個責任，叫他怎麼能彀擔荷他呢？」[32]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原理下，一旦陷入「萬古如長夜」的「昏睡」狀態，便會面臨「殺、刺、砍、斬」的「汰演」命運。

1903年，俄日在中國東北的戰役更觸發作家積累已久的「瓜分」憂患。1904年，由上海獨立社出版、標「政治小說」、仿章回體的《瓜分慘禍預言記》以「俄日之戰」為背景，凸顯瓜分危機——「不能抵拒俄國，讓俄國獨得厚利，將東三省占了」，各國「也須向貴國求得同等利益」。署名「軒轅正裔」的作者以各種倫理之殃如「父母被殺，妻女被淫，財產遭劫，身軀受戮」喻示中國

28 東海覺我，〈情天債〉，第 1 回，頁 8、7。

29 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 1 期（1904 年 1 月），頁 1、2。

30 東海覺我，〈情天債〉，第 1 回，頁 4。

31 轉引 Umberto Eco, 'Introduction', *On Ugliness* (New York: Rizzoli, 2007), p. 15.

32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晚清小說大系》第 16 冊，第 3 回，頁 19、20。

受到列強的侵佔。[33]此「殺、淫、劫、戮」如同〈情天債〉的「殺、刺、砍、斬」，以激烈劇痛的身體意象傳達國體的瓜分命運：「將來這北方一帶，便換了俄國的顏色了；這揚子江流域，便變了英國的顏色了；這山東便變德國的；兩廣、雲南便變法國的；福建、浙江便變日本的顏色了……可憐我們四千年的國家，一旦滅了，連圖上也不能占一顏色，而且我們寸膚滴血，皆是他養成的，我祖宗父母身上一根毛、一滴血，也是他養活的，所以才能夠有我。如今他滅了，世界上便沒有他了。我的兄弟，你道傷心不傷心呢？」人物呼天搶地、頓足捶胸、嚎啕大哭、抽搐痙攣、吐血倒地，說明國勢愈是危急，身體的反應愈是激烈。作者極盡焦灼煽情之能事，調動各種砍伐殺戮的慘烈意象，如「快把刀來將我殺死了，再來碎屍萬段的斬了，尚是不能蔽我的罪。這中國是生我的父母，是活我的恩人」、「何不把我黃勃雷擊火燒，蛇吞虎咬，水淹刀傷，油煎岩壓的嚴嚴重罰，代我中國受這場的惡禍。爲何卻把我的中國亡了！爲何卻把我的中國亡了！」[34]相比起劉鶚與徐念慈以身體隱喻國體的技法，《瓜分慘禍預言記》直接將「國體」與「身體」此原屬不同層次的概念連接：個人身體的「寸膚滴血」受之「中國」，如今「他亡了」、「他滅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個人肉身如一敞開的血腥屠場，出現「將我殺死」、「碎屍萬段」、「蛇吞虎咬」、「水淹刀傷」、「油煎岩壓」等慘烈的意象。此取代隱喻法的因果聯繫，或可清楚指陳「身體」與「國體」的休戚與共，卻失去文學想像的空間，反映作者的改革訴求更大於美感期許。

從梁啟超文論中的「斷、瘵、傷、涸」到晚清小說「殺、淫、劫、戮」、「殺、刺、砍、斬」，一再以血肉筋骨、肉身軀體的慘烈意象表達四分五裂的領土、積弱不振的國勢。可是，一旦「國體」涉及政府政體時，時人又開拓出不同於殺戮砍伐的意象，將「人形」拉扯歪曲成為「非人」的樣態，表現其對朝廷專制的激烈批判。1906年，蕭然鬱生刊登於《月月小說》的〈烏託邦游記〉安排一飛往烏托邦國度的飛艇，內部設有可讓搭客「聽奏樂各人形喜怒，觀演劇獨自悶胸懷」的舞台，上演「地球上最有名的一個四千餘年來的專制國」戲碼。此一「舞台」的場景設計恰能產生聚焦的作用，放大舞台上「像幾隻畜生起來了，手腳也是畜生，面目也是畜生，伏在地下，竟像可以騎的一樣」的人物形象。作者沒讓舞台上的角色發出任何言語，幾近於默劇的形式，透過「人不像人，畜不像畜，鬼不像鬼」的形體，淋漓盡致展現摧枯拉朽、腐敗墮落的

33 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25 冊，第 2 回，頁 301；第 1 回，頁 294。

34 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第 3 回，頁 314；第 2 回，頁 301-302。

「四千餘年來的專制國」形象。[35]1907年，由新世界小說社刊出版、作者不詳的《憲之魂》更進一步調動民俗傳統的鬼魅想像，以荒誕不經的群鬼亂竄抨擊朝廷政體，儼然「鬼中國的詛咒」！晚清的「鬼聲魅影」頗有乾嘉時期《斬鬼傳》、《平鬼傳》、《何典》中「談鬼物正像人間」之風，[36]在「一個個都顏色慘變，狀貌猙獰」的「非霧非煙的幢幢鬼影」中，寫出「營私納賄」的糊塗鬼、「一塌橫陳」的鴉片鬼，「在上的不顧民生，在下的不知自治，弄得九泉下財匱民窮，不成世界」。[37]就「進化」原理而言，此人畜鬼組合更偏離前述的常態健全、生氣蓬勃，投射「亡國滅種」的憂患，如時萌對晚清小說作者的評論：「揮動著冷光閃閃的匕首，刺戳著社會的整體，揭開了它渾身潰爛的現狀」，「將一切垂死的東西送往——陰曹地府——去」。[38]可惜的是：此「非人化」書寫缺乏敘事轉化，更多止於表層的標籤作用，尚難闢及彼時西方「世紀末」書寫挖掘的迷離惝怳的精神世界與純藝術美感的追求，[39]而是受到動盪時局、分裂夢魘的制約，使得其政治寓言性遠高於藝術美學的追求。

雖然在美學取向上，晚清作者可能因其強烈的批判之聲而錯失原可達到的高度或深度，可是就小說史的演進而言，饒富意義。晚清的國勢傾頹牽引出各種形象化的書寫，歪曲的線條、凹陷的窟窿、斷裂的肢體無不回應政治秩序的解體、文化取向的失效、國族存亡的焦慮，早在魯迅小說前已開拓鮮明的身體／國體視角。時人以繪聲繪影、窮形盡相的潰爛、昏迷、倦怠、斷裂、癱瘓、鬼魅化身體，演繹動盪的時局、瓜分的領土、腐敗的政府等，開啟一幅幅隱藏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話語的「身體時局圖」。

35 蕭然鬱生，〈烏託邦游記〉，《月月小說》第 2 號（1906 年 11 月），第 4 回，頁 11。

36 魯迅，〈集外集拾遺．《何典》題記〉，《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 7，頁 308。

37 佚名，〈憲之魂〉，收入林辰、段文桂主編，《梟鬼雄魂記》（瀋陽：遼沈書社，1992），第 1 回，頁 351；第 1 回，頁 280。

38 時萌，《晚清小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頁 144-145。

39「世紀末」指向 19 世紀末西方人在高度文明世界中所出現的負面情感，如 Max Nordau 於 1892-93 年間的著作 *Entartung*（英譯：*Degenaration*）在‘Diagnosis’一章以世紀末症狀病理化，「a morbid deviation from an original type」，出現精神創傷、情緒失調、精神委靡、敏感易怒、心理倦頹、歇斯底里等。籠罩於倦怠的文化氛圍，王爾德、比亞茲來與法國象徵主義家等在「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下採取一種「頹廢」的姿態傾向，拒絕藝術的道德與社會功能，尋求純粹的美感。見 Max Nordau, ‘Diagnosis’, *Degener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pp. 15-33；Chris Baldick, “Fin-de-siècle”,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7.

三、小說診斷學：「回春妙手，救國良醫」

當「中國」被塑造成潰爛、昏迷、倦怠、斷裂的身體，預告了近現代文學的「疾病」隱喻，[40]把中國病人推到手術床，接受一連串的診斷與治療，形成醫／病此相互指涉的想像（以下統稱「醫病」）。關於文學的「疾病」研究時有所見，[41]我欲思考的是：晚清作者群如何結合崛起於彼時的醫學技術、改造論述與器物發明，在小說敘事中展開醫病想像？

時勢牽動身體／國體的表述。當中國面臨列強的侵襲而頹敗不堪，慨然有問世之志的作者群愈感國勢阽危，將國體置入「病體」的敘述架構，如「東亞病夫」此病體化的標籤，[42]經由一番生成演變，成為「中國」與「中國人」的標籤。[43]「新小說」此一高度訴求改革的文體一再出現「病夫」、「病國」的標籤，[44]使得「複雜的諸種關係網失去了原有的平衡」。[45]不過，反映個人與周

40 「疾病隱喻」乃是透過「疾病」的某些特徵轉移為社會、文化等症狀的暗示，「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頁 55。

41 如：David L. Freeman & Judith Z. Abrams, *Illness and Health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Writing from the Bible to Toda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9); Andrew Hodgkiss, *From Lesion to Metaphor: Chronic Pain in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Medical Writing, 1800-1914*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Samuel Vaisrub, *Medicine's Metaphors: Messages & Menaces* (New Jersey: Medical Economics Company Oradell, 1977)；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等。

42 「東亞病夫」的符碼涉及翻譯與傳播，1896 年 10 月 17 日，上海英文報刊《字林西報》轉載英國倫敦《學校歲報》一文，同年 11 月，張坤德翻譯刊登於《時務報》，名為〈中國實情〉：「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同年 12 月，《時務報》又刊出〈天下四病人〉，將「中國」列入「病人」。此一聯繫引發回應，「病夫」與「中國」隨後經由一連串的表述而根深蒂固地植入民心。見張坤德譯，〈中國實情〉，《時務報》第 10 冊（1896 年 11 月），頁 15；張坤德譯，〈天下四病人〉，《時務報》第 14 冊（1896 年 11 月），頁 12。

43 關於「東亞病夫」符碼的生成與演變，可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5 月），頁 1-44。

44 此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 5 回標題凸顯「病」與「藥」：「對病論藥獨契微言」；東海覺我〈情天債〉疊合「病夫」與「老大帝國」：「列位試想，六十年前老大病夫

遭世界裂變的「疾病」也引發拯救的契機，如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疾病」與「國家失序」之間的類比被認為能「敦促統治者追求更為理性的政策」。[46]此將疾病視角置入社會、國家治療學的言說模式大量出現於19世紀的西方文化界，如亨利‧烏特（Henry Wood）的*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反映醫學結合進化論、醫心運動（mind-cure movement）、新思想、心理衛生、自我改造並配合著衛生學的視角，且隨著1896年晚清傳教士傅蘭雅的中譯（名為《治心免病法》）而進入中文語境。[47]

值此「醫病」言說模式的轉變中，晚清小說作者群結合醫學、文化、政治、思想、心靈等論／敘述，拓展醫病想像，甚至從「醫心」擴及肢體、器官、意念等，構成更廣泛的「治心免病法」，心、腦、身、欲都可視為醫治的對象。以兩部發表於1904年的小說為例：荒江釣叟刊登於《繡像小說》第21號至62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與海天獨嘯子由東亞編輯局刊行的《女媧石》，分別透過「治心」與「治腦」開啟「小說診斷學」。就文學史演進而言，作家以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醫病想像早在五四前便實踐。荒江釣叟在小說中塑造的「醫」心視角正可呼應《繡像小說》創刊時強調的「改造」主旨：「支那建國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謬荒誕之言，即記污穢邪淫之事」，於是「糾合同志」，「遠摭泰西之良規，近挹海東之餘韻」，「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鑑。」[48]荒江釣叟安排龍孟華乘汽球飛過「泰西」、「海東」尋妻的敘事，意不在於搬演凡爾納式的「環遊世界八十日」，卻反映「醒」／「砭」／「鑒」（中國）「黑暗之心」的治療之旅。藉由行旅、距離、異域而開啟的「我族」觀照，龍孟華此中國「義士」、「志士」不見活潑氣象，反

的帝國，如何能一變至此呢？」；春颿《未來世界》透過「未來」想像將「過去」的中國列為「老大病夫」：「現在的中國是立憲以後的中國，與那以前老大病夫的中國不同。」分別見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第7期（1903年9月），第5回，頁27；東海覺我，〈情天債〉，《女子世界》第1期，楔子，頁2；春颿，《未來世界》，《月月小說》第24號（1909年1月），第25回，頁205-206。

45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108。柄谷行人在文中探索日本文學的「肺結核」書寫及其反映的社會、文化症狀。

46 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頁69。

47 劉紀蕙，《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頁103。劉紀蕙在文中探討「醫心」話語如何扣連倫理意識的翻譯與重構，牽動中文脈絡論述結構的變化，頗有參考價值。

48 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第1期（1903年5月），無頁碼。

而掣襟露肘，終日以淚洗臉、自怨自艾：「蒼天啊！蒼天啊！你難我龍孟華也算是難到盡頭了。」[49]龍孟華沿途因髮辮、黃皮膚等屬性而備受藐視，精神狂亂，陷入昏迷，承擔起因家國、文化、歷史、倫理失序而引發的危機。

「醫」需要「病」承載的負面符碼，才能彰顯診斷治療的功能。作者安排「龍」體躺在孟買醫院的手術床接受透光鏡檢驗與開刀解膛，涉及近代人體解剖學、病理解剖學、診斷學、麻醉法以及各種醫療器具（如聽診器、血壓測量、體腔鏡檢查器等）在中國的傳播。[50]各種臨床診斷、手術療程、人體構造學經由衍生變調的方式出現在小說敘事。國外醫師哈克參以「透光鏡」掃瞄、診斷與記錄「龍」體：「心房上面藍血的分數佔得十分之七，血裏的白輪漸漸減少，旁邊的肝漲得像絲瓜一樣，那肺上的肺葉一片片的都憔悴得很」。做為「病體中國」的「龍」體在X光的穿透下被診斷為血液失調、肝漲、肺葉枯縮等多重併發症，病因歸咎於「傳統」弊端：「中國有種甚麼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後，那心房便漸漸縮小，一種種的酸料、濫料，都滲入心窩裏頭，那膽兒也比尋常的人小了幾倍」，[51]因而得開刀解剖。荒江釣叟對「龍」體的手術清理與淨化，反映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所謂的「卑賤物」之「拒斥」（abjection）：切除異質的急迫性乃因面臨屍體、腐爛物、疾病、感染物般代表來自體系外的危險，自我受到非自我的威脅，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脅。[52]八股就如屍體、腐爛物、疾病、感染物等會攪亂身分、干擾體系、破壞秩序的「卑賤物」。

在醫病想像中，「醫學」與「文學」的視角並非和諧共處，內蘊著仿／反醫學的衝突感。作者一方面援引醫學原理塑造醫生替病人開膛剖腹的情節，可是一方面又被治療功能牽引而導入反醫學的脈絡。此如作者寫醫生以「透光鏡照了一番」後，「拔出一柄三寸長的小刀濺著藥水，向胸膛一劃」，乃是以「透光」檢驗人體後再開刀解剖的手術流程，接下來卻「用兩手輕輕的捧出心來，

49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第 12 回，頁 63。

50 關於西醫在中國的傳入、發展以及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的傳播，可見鄧鐵濤、程之範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頁 310-317、358-383。關於「人體」與解剖學的傳播，如該書指出：1850 年，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編《全體新論》；1875、1886 年，同文館教習德貞出版《解剖學圖譜》、《全體通考》；1878 年，柯為良翻譯《格雷氏系統解剖學》；中國學者丁福保編《新撰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總論》。

51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第 12 回，頁 64、66。

52 朱莉婭．克利斯蒂瓦著，張新木譯，《恐怖的權力——論卑賤》（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6。

施向面盆裡面，用藥水洗了許多功夫」，又吩咐實習員托著病人的心，「倒了些藥水向那肝肺上拂拭」，一一洗淨心、肺、肝，安置回去後，「不用線縫」，以「棉花蘸了小瓶的藥水」擦拭，「那胸膛便平平坦坦，並沒一點刀割的痕跡。」[53]「龍」體接受檢驗、解剖、治療、縫合的醫療效果愈是寫得擲地有聲，愈是偏離醫學原理；其愈偏離醫學原理，愈能反映作者急切的改革之心，醫學原理變為實踐文學治療的手段。荒江釣叟以仿／反醫學的悖論達成如此一則敘事教誨：唯有將致使「心房便漸漸縮小」的毀國滅身的傳統荼毒徹底洗淨後，才能讓病體痊癒。由此，「龍體」的醫病想像隱藏著現代與傳統、文明與落後、醫生與病人、拯救與被拯救的身分地圖，透過前者對後者的凌駕，牽扯出李歐梵所謂的「現代性」與「傳統」的交鋒：「從道德的角度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精神上患病的民族』，這一看法造成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一種尖銳的兩極對立性：這種病態植根於中國傳統之中，而現代性則意味著在本質上是對這種傳統的一種反抗和叛逆，同時也是對新的解決方法所懷的一種知識上的追求。」[54]

標榜「閨女救中國」的海天獨嘯子《女媧石》將「心」的治療推到「腦」的治療，拓展驗／洗腦術，反映近代身體觀的轉變。[55]海天獨嘯子以天邊殞落的「女媧石」做為開場後，從《紅樓夢》轉成《水滸傳》脈絡，開拓晚清版的「女性水滸傳」。根據臥虎浪士的〈序文〉，可見海天獨嘯子以男性視野預設晚清習見的「女性救國」話語：「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雖然，欲求婦女之改革，則不得不輸其武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識。」[56]於此性別規訓的眼光中，海天獨嘯子凸顯女角色的身分改造，讓瑤瑟乘空中飛馬考察國勢時遭人射落昏迷，送到四周掛有解剖圖、生理圖、微蟲圖的「洗腦院」。作者藉由紅十字社員楚湘雲與瑤瑟的對話交代「洗腦院」主旨：社長湯翠仙因人民暗喻國疾的「軟骨症」，許諾國病若癒，「願洗四萬萬腦筋奉答上帝。今已建醮半年，洗下腦筋也有四五百萬了」。「軟骨症」反映晚清作者對羸弱、卑怯等國民性的批判，而「洗腦院」則凸顯其對國民性改造的企圖。

53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第 12 回，頁 65。

54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 177-178。

55 關於從「心」轉向「腦」的凸顯，如張寧指出：「心」原本在傳統的地位無可取代，代表思想之源，專職思慮，是神智清明的關鍵，舉凡情緒、意志、精神等，都是心的作用。一直到西方解剖學、生理學傳入後，出現明顯改變，如倫敦會傳教士合信《全體新論》指出「腦」的功能，影響深遠，開啟近代中國由「心」到「腦」的新身體觀。張寧，〈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頁 1-40。其中「腦觀的轉化」一節（頁 8-17）專門討論「腦」。

56 臥虎浪士，《女媧石．序》，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25 冊，頁 441。

在批判與改造的敘事架構中，仿／反醫學的「驗腦剖腦」顯得輕鬆俐落，重點不在於醫學邏輯的合理性，卻是隨之衍生的文學治療。海天獨嘯子塑造一系列可呼應前述亨利・烏特的「mental photography」，對腦筋影像做出「腦—國民性」的掃瞄：官場人士因觀摩上司意旨，腦筋「其色灰黑，如煙如霧」、「現出一個上司相片，周圍筋絡交錯，好似金錢現影」；士子熟唸朱注八股，腦筋「其臭如糞，其腐如泥，灰黑斑點，酷類蜂巢」；學生虛唱革命、假談自由，實想著妻妾頂翎，腦筋「其虛如煙，其浮如水」。由此，「洗腦院」變成文化身分的檢驗、改造中心，反映作者切除「異質」的絕對性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腦筋為利祿所惹壞，「用綠（氯）氣將他漂白」；腦筋印有相片或金錢影，「用硫強將他化除，再用骨灰將他濾過」；腦筋如煙如水者，「能用藥使之凝結，又能用藥使之結晶」，碰到「洗不可洗，刷不可刷」時，更出現駭人聽聞的治療方式：「挖去原腦，補以牛腦」。在「說話者」（洗腦院）與「聆聽者」（瑤瑟）的相互唱和中，此壓抑「非我」的暴力成分受到合理化，瑤瑟高度讚頌對方：「真個回春妙手，救國良醫！若非貴領袖婆心慈腸，發下這等大願，怎能再造國民，重睹天日呢？」就小說敘事安排，瑤瑟原被誤為「腦內必有反筋」的清廷奸細而被射落，必須剖腦「加工洗滌，務必撥亂反正」，可是卻被發現「潔白無垢，不似亂臣賊子」。[57]原本由瑤瑟與紅十字會的誤會而營造的「洗腦院」情節，在小說理論中屬於「危機」（crisis），可讓作者繼續渲染不同陣營的衝突與誤會。可是，作者無意延緩衝突，讓「危機」急轉到「下降動作」（falling action），賓主瞬間盡歡。除了「腦」的治療外，海天獨嘯子長驅直入女性身體的禁區，將生殖器視為務必除去的卑賤物：「人生有了個生殖器，便是膠膠黏黏，處處都現出個情字，容易把個愛國身體墮落情窟，冷卻為國的念頭。所以我黨中人，務要絕情遏欲，不近濁穢雄物。」[58]當「情欲」變成「國家」大防，專收女性會員的「花血黨」規定入黨者必須「滅下賊」——割除生殖器官，不近雄物。此將「情欲」病理化、卑賤化而得管控改造的敘事，亦出現在1909年許指嚴的《電世界》，十歲男女都得到修養院服用可清心寡欲的「絕欲劑」，中年後才會春情發動，「這時閱歷深了，主見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竟沒人做出來了」。[59]

從上述兩部作品，可見1904年的中國小說書寫已拓展出豐富而完整的醫病想像，牽引出文化傳統、國民性批判等思考，大致奠定了晚清結合醫學、文化、

57 海天獨嘯子，《女媧石》，第 10 回，頁 496、497、498、496。

58 同上註，第 7 回，頁 478。

59 高陽氏不才子，《電世界》，《小說時報》第 1 期（1909 年 10 月），第 11 回，頁 41。

思想的醫病書寫模式。晚清作者群繼續於此基調推陳出新，擴展更多敘事樣態與思考內涵。1905年，吳趼人連載於《南方報》、1908年由上海改良小說社出版的《新石頭記》提供另一種命題的醫病想像。作者在最關鍵兼轉折的第22回合——寶玉從黑暗社會進入「文明境界」時，嵌入具有檢驗、篩選功能的「過關」儀式。作者以醫病想像替「天演」門檻把關，各闖關者必須通過「驗質性房」的X光檢驗，「隔著此鏡，窺測人身，則血肉筋骨一切不見，獨見其性質。性質是文明的，便晶瑩如冰雪；是野蠻的，便混濁如煙霧。視其煙霧之濃淡，以別其野蠻之深淺。」當X光檢測法從身體內部的掃瞄轉而文明性質的判斷，醫學原理必定變成身分改造的論述：「若驗得性質帶點野蠻，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質所去，等醫生把他性質改良了，再行招待」。如此的「過關」門檻正是實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教條：「將入敝境時，要先歷一番劫運，也是天演的定例。」[60]

吳趼人透過仿／反醫學的「煙霧之濃淡」測量法安排寶玉取得過關資格後，繼續以醫病視角讓他遊逛「文明境界」的醫院，見識「專驗骨節上毛病」的驗骨鏡、「現出了半紅半白的骨髓」的驗髓鏡、「血運行上下」的驗血鏡、「通體筋絡全現」的驗筋鏡、「五臟六腑歷歷分明」的驗臟鏡等。作者刻意渲染寶玉藉由透光術看到自己「雪白一具骷髏」時的魂不附體，凸顯近代中國人面向器物發明的心理震撼。不過，吳趼人闡揚文化傳統與道德倫理的立場，讓他發展出不同於傳統與現代交鋒的命題，將仿西方醫學的驗腦、耳、目、鼻、舌及五臟六腑鏡變為中國英雄「竭瘁精力，創造出來」或中國「古已有之」，處處針砭西醫「不及中國古醫」、批判西醫肢體鋸截法的「野蠻殘忍」。[61]王德威評論晚清小說時曾提出不同「真理」相互爭鬥的「修辭戰場」概念：作者可透過修辭自圓其說，迴避任何解釋，亦可顛倒時代，將「過去」拯救回來，搶先預見未來。[62]於此「修辭戰場」中，吳趼人逆轉頹勢，縫合晚清人面臨的「歷史」與「價值」內在統一性的撕裂。[63]當頹敗的「歷史」（如傳統文化、倫理、

60 吳趼人，《新石頭記》，《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35冊，第22回，頁282；第39回，頁399。

61 同上註，第24回，頁295、296。

62 此「修辭戰場」乃是借用王德威評論晚清「科幻奇譚」時提出的概念。見王德威著，宋偉傑譯，〈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譚〉，《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332-333。

63 列文森指出：「每個人對歷史都有一種感情上的義務，對價值有一種理智上的義務，並且每個人都力求使這兩種義務相一致。一個穩定的社會，是一個大家在普遍原則上選擇他們所承繼的獨特文化的社會。」見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

政治觀念）無法做為晚清人的價值依據時，吳趼人透過「修辭戰場」將西方醫學發明列入中國「古已有之」的系譜，使得「歷史」再次輝煌，理所當然地轉化成當下的價值依據。更精確而言，《新石頭記》已非「現代性」與「傳統」的交鋒，卻是「歷史」與「價值」的斷裂與縫合。

就晚清小說的醫病想像，可見各作者賦予文學診斷民族痼疾的功能，構成文學／醫學的視野。以此而言，魯迅「棄醫從文」的生命歷程與「喚起療救」的書寫內涵，使他成為文學／醫學最鮮明的標誌。不過，在魯迅之前便崛起於晚清小說界的陸士諤（1879-1944）早已初試啼聲。陸士諤，名守先，生於古鎮珠溪鎮（今上海朱家角），自幼從朱家角名醫唐純齋學醫，父逝後到滬行醫，鮮有患者問津，改營租書業，潛心鑽研小說。小說界前輩海上漱石生（孫玉聲）時於福州路開設上海圖書館，勸陸士諤到上圖設診懸壺。[64]比起劉鶚或魯迅的「棄醫從文」，陸士諤可謂「醫文兼具」：醫生陸士諤替病人身體診療，作家陸士諤替中國國體把脈。魯迅雖只比陸士諤少兩歲，可是出道甚晚，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已屬五四階段。「醫文兼具」的生命背景與小說書寫的時間點，都使得陸士諤的代表性不可忽略。1910年，陸士諤由改良小說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新中國》第四回的標題「催醒術睡獅破濃夢，醫心藥病國起沉屙」，正能反映其一生替「病體中國」尋找「催醒術」與「醫心藥」的心志。為達成「催醒」、「醫心」的診療意義，陸士諤《新中國》先採取類似吳趼人的「修辭戰場」，將西方技術篡奪成「中國發明／改良」，如西方「愛克斯光」由「我們國裡光學大家改良了三五回」，便可「隔著六七丈厚石壁，也能夠洞燭無疑」，捍衛民族尊嚴時，也解決中國何以凌駕全球的邏輯問題。穿透石壁的X光讓「中國之心」無所遁形！作者安排發明家蘇漢民發明治療中國之心的「醒心藥」，可讓心邪者歸正、心死者復活、心黑者變赤、疑心變決心、怯心變勇心、刻毒心變仁厚心、嫉妒心變好勝心。「心」網恢恢，疏而不漏！陸士諤透過「心的變異」，力挽狂瀾，改變「歐美日本人都稱吾國為病夫國」，「國勢民風，頃刻都轉變過來」。[65]

具有醫學背景的陸士諤更進一步以「種牛痘」原理，回應中國哲學傳統關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3-4。按照列文森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討論，所謂「歷史」包含傳統的文化、倫理、政治觀念，而「價值」則是當下的生活思考。

64 此參考嚴芙孫等，〈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收入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頁 494-495；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陸士諤年譜（1878—1944）》（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285-290。

65 陸士諤，《新中國》，第 4 回，頁 476、479、480。

注的問題——人性之「惡」。崛起於18世紀的種痘術於19世紀初譯入中國，[66]藉牛痘病毒具有與天花病毒相似的抗原（antigen）之理，使得曾感染牛痘病毒者的免疫系統製造天花抗體（antibody），即可杜絕天花病毒的入侵。陸士諤對「種牛痘」有所偏好，如他在《新野叟曝言》一書中虛擬的「無毒世界」：「先以癆症喉痧傷寒急痧等之微生毒物，設法取下，再用刀佈種於畜類身上，病發而死，再傳種於健強的畜身上，輾轉傳種，必至所種之畜，病發而死。方止，然後收取其漿，移種人的身上，此人被種後，即可永遠不染此等毒症。」[67]他在《新中國》更是異想天開，試圖以種牛痘法遏止「惡」的滋生，「人萌惡念，總因肚裡頭惡根性沒有除掉」。陸士諤將原屬倫理範疇的「惡」念病理化成體內病毒，再藉由醫病想像塑造「藥到病除」的敘事：嬰兒未滿周歲時便要仿種牛痘般將惡根性種在手臂上、未及施打的成人則可服用藥水，「惡根性便從大便裡一瀉而出」，即或是豺狼虎豹服藥後「和善得綿羊一般了」。病症較重者則「用刀解剖，取出惡根性才好。」[68]小說中仿／反醫學原理顯然忽略每種疾病對應的抗原，過於一廂其願、以偏蓋全，不過愈加反映其治療身體／國體的急切心理，使得歷史、現實、政治的糾葛、矛盾、分裂、痛苦，可以一蹴而就地翻轉過來。當救國欲望與民族尊嚴凌駕一切，小說的「修辭戰場」極易走向神秘式的「操之在我」的戰鬥宣言。

在晚清的頹衰時勢中，具有「改造」之喻的「醫病」想像恰逢其時，成為時人診斷治療中國的視角。就文學書寫而言，論者已指出：「中國現代作家把中國看作一個有病的軀體，把自己放在醫生的位置，為其診斷和治療，腐爛的身體與腐爛的文明一起構成了整個中國現代的歷史。」[69]晚清小說正好可視為現代文學的轉軌，將「病體中國」推上手術床，接受醫學器物如透光鏡、驗腦機、解剖刀的穿透，實踐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敘事。

四、魂體對比法：「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

就近代改革趨勢而言，晚清知識分子從外延的技術、制度等層面轉到內向的文化探求，發現國民的智力、體力、精神、道德的落後才是救治的對象，掀

66 斯坦頓（G. T. Stannton）於 1815 年將英國醫生皮爾遜（A. Pearson）的《種痘奇法》譯成中文出版，皮爾遜的學生邱浩川經由詮釋後，改名《引痘略》，於 1817 年印行。參見鄧鐵濤、程之範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501。

67 陸士諤，《新野叟曝言》（上海：上海改良小說社，1909），第 3 回，頁 33。

68 陸士諤，《新中國》，第 10 回，頁 522、523。

69 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頁 4。

起鑄魂、新民、鼓民力、體育、尚武等「淬魂鍊體」的論述。若聚焦於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主軸，各種身體的改造方案恰能回應前述的「醫病」想像，[70]替「病體中國」注入可以起死回生的價值體系。我將於本節討論晚清作者群如何在小說敘事中以極大化的「對比」架構來淬魂鍊體？

晚清論者一再馳返「招魂」傳統，以仿「國殤」主題、「楚辭」文句，拓展炙熱激昂又感傷抒情的語調，或激憤列強瓜分或哀嘆江山之逝。1899年，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指出：「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71]1903年，壯遊〈國民新靈魂〉將「無魂」轉化成巧立名目之「魂」：「奴隸魂、為僕妾魂、為囚虜魂、為倡優魂、為餓殍待斃一息之魂、為犬馬豢養搖尾乞食之魂」。[72]從「無魂」到「奴隸、僕妾、囚虜、倡優、餓殍待斃、搖尾乞食之魂」，反映晚清「失魂落魄」的歷史遭遇，卻也激發時人的鑄魂論述。梁啟超提出「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73]自1902至1906年陸續於《新民叢報》發表《新民說》，發揚冒險、進取、權利、自由、自治、毅力、進步、自尊、合群、尚武、公德、民氣等精神特質；壯遊則形象化地勾勒「淬魂鍊體」的場景：「上九天下九淵，旁求泰東西國民之粹，囊之以歸，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安排「孔子司爐，墨子司炭，老子司機……皇帝視其成」，將「病體中國」陶鑄成「山海魂、軍人魂、遊俠魂、社會魂、魔鬼魂」。文章以波瀾壯闊的聽視覺意象渲染「淬魂鍊體」後的氣氛：「國旗翻翻，黃龍飛舞，石破天驚，雲垂海立，則新靈魂出

70 關於本文「魂體」之「魂」偏向於靈魂，而「體」偏向於形體。對於晚清論者而言，經常可見到「軀殼」／「形體」與「魂」／「精神」的論述，如吳趼人提及：「軀殼我所有也，魂靈亦我所有也，以一我而統是二者，是二者必相依附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丁福保對「魂魄」的解釋：「心身之異名。魂者心識，有靈用而無形者。魄者有形體而為心識之依處者。禮記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注曰：『魂者神也，陽也，氣也。魄者精也，陰也，形也。』諸經要集十九曰：『魂是靈，魄是屍』。」見吳趼人，〈還我魂靈記〉，收入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卷 8，頁 241；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收入《佛學工具書集成》第 32 冊(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9)，頁 2499。

71 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357。

72 壯遊，〈國民新靈魂〉，收入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卷 1，頁 572。

73 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頁 357。

現而中國強矣」，[74]表現「國族化」的魂魄修辭。

從梁啟超的「製造」到壯遊的「化分／鑄／旁求」等積極性的動詞，表現「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決心，差異在於發言主體隨著論述場合而牽動的價值方案。晚清「新小說」的位置恰能呼應「除舊佈新」的訴求，從「新小說」命名便可見其「新」民／國／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訴求。[75]小說牽涉到敘事技法的問題，到底晚清作者要如何放大「化分／鑄／旁求」的能動性？就文學修辭而言，「對比」或「對襯」乃是一可以勝任的手法，「揭出互相反對的事物來相映相襯的辭格……將相反的兩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說的一面分外鮮明」、「相反的觀念或事實，對列起來，兩相比較，從而使語氣增強，使意義明顯。」[76]作者在小說中置入極大化的「對比」架構，使得兩個在感覺特徵或寓意有所差別或相反的魂體擺在一起，經由「繼時性對比」（successive contrast），產生價值差序的誘導力（induction），放大「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訴求。

以頤瑣連載於1905年《新小說》、標「社會小說」的《黃繡球》為例，正可見「舊女性」經由夢啟而變成「新女性」的對比修辭。[77]頤瑣以人物命名做為轉軌：黃繡球原名「黃秀秋」，承載傳統女性的從屬命運，自幼父母雙亡，「饑一頓，飽一頓」，「過了四歲，就當作丫鬟使用」，「夏天任她睡在蚊子堆裡」。嫁給黃通理後，「索從了丈夫」、「日後從了兒子」，又將女人的從屬性歸咎於「一個女子，小腳伶仃」，只能「幫夫教子」。[78]頤瑣接而將「秀秋」置入「化分／鑄／旁求」的架構，實內蘊自己的經歷。根據論者考證，頤瑣原名湯寶榮，字伯遲，江蘇吳縣人。[79]湯寶榮的生平線索甚少，不過就其尚

74 壯遊，〈國民新靈魂〉，頁 572-573。

75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884。

76 陳望道，〈映襯〉，《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頁 94；黃慶萱，《修辭學．映襯》（臺北：三民書店，1975），頁 287。

77 「新女性」在晚清有特定的意義，如黃錦珠指出：「『新女性』指的是小說中出現的具有新觀念或新作風的女性人物」，涉及「晚清爭取女權時所提出的各種突破傳統女子規範的主張，以及由此延伸而產生的看法，例如自由結婚的主張，衍生出男女公開社交的要求」等，當中更伴隨兩大訴求：廢纏足、興女學，「晚清小說中出現的新式女子幾乎是以放足或天足，以及進女學堂讀書為必備條件。」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緒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 21。

78 頤瑣，《黃繡球》，《晚清小說大系》第 22 冊，第 2 回，頁 8、11、12。

79 關於「頤瑣」的身分與考證，可見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222；郭長海，〈《黃繡球》的作者頤瑣考〉，《社會科學

未受到太多注意的文章——替徐珂〈天蘇閣《娛晚圖》〉寫的序文可得知：湯妻史靜偕曾受美國大夫柏樂文夫人的鼓勵，以五十歲之齡「毅然解其錮蔽而舒其趾焉」。[80]湯寶榮敘說妻子解放纏腳之事時潛藏了男性認可的隱性語調，恰好也反映在其筆下的人物身上。頤瑣安排「黃通理」此一「通情達理」的丈夫鼓勵秀秋有關「女性」可擺脫「做點針黹，織點機，洗洗衣裳，燒燒飯」的命運，使得秀秋意識到女性可將村子「做得同錦繡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改名「黃繡球」。[81]胡纓討論「黃繡球」的名字轉變時指出：「她的『繡』地球的新形象建基於傳統的女工；這也通過地方政治活動——一個像刺繡那樣務實的、精細的工作計畫——顯現出來了。同時，這一新身分也通過一種全球意識、一種巨大的包容性意識顯現出來。」[82]此一「全球意識」的啟動有賴於西方哲人的啟蒙，作者恰好將柏夫人啟蒙妻子的片段做了一番渲染，替黃繡球找來西方「代理母親」（surrogate mother）[83]——法國羅蘭夫人，經由夢中的啟蒙指導，使得黃繡球從蒙昧的「萬古如長夜」甦醒，得知一批為「自由平等」而奮鬥不懈的泰西英雄，如牢中著書立說的匈牙利噶蘇士、堂上辯說信教之自由的馬丁路得、義砍英王的克林威爾、寫小說反抗俄國專制的托爾斯泰等。黃繡球深受激勵，覺悟到女性也可掙脫君、父、夫、神權的「自由平等」理念，從此解放纏腳、去除迷信、提倡國民教育、爭取女性權益。

戰線》第 64 期（1993 年 7 月），頁 241-242；徐新韻，〈對《黃繡球》作者頤瑣就是湯寶榮的補證〉，《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第 1 期，頁 104。

80 頤瑣在文中憶及他二十年前病重時向美國醫生柏樂文求診之事。其妻史靜偕帶十四歲、「蓬首赤足」的婢女意蘭為他取藥。柏樂文之妻鼓勵史氏解放纏腳：「纏足束腰，鈞之惡俗。如意蘭兩足天然，不受矯揉造作之苦，誠可兒也。彼固吳產乎？吾游吳久，凡吳治遠近數百里，自女傭外，田家婦無論矣，若漁若樵若賣菜賣花，乃至肩挑背負，婦女皆優為之，輒雜男子力作，為勞動之事。靜偕深然其言，歸以語余，余亦心識之。」見湯頤瑣，〈附徐仲可先生天蘇閣娛晚圖序〉，《純飛館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 16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 22-23。

81 頤瑣，《黃繡球》，第 2 回，頁 14。

82 胡纓，〈羅蘭夫人及其中國姐妹〉，《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180。

83 胡纓透過晚清時人探討女醫生康愛德（曾被美國人收養）的傳記，提出「代理母親」的概念：「新女性」需要一位美國替身母親，以便被「恰當地」撫養成新中國的現代國民。似乎為了成為新的國民，她必須先「屬於」某個非中國人，被一個外人「接管」，接受那些非其所有之物為其所有。與其說收養情節提供了一套特殊的文化價值，不如說提供了一張進入世界家庭的入場卷。胡纓，〈羅蘭夫人及其中國姐妹〉，頁 172-173。

西方的「代理母親」固然「提供一張進入世界家庭的入場卷」，[84]可是，黃繡球的「新女性」養成方案不止於西方啟蒙，卻是「旁求泰東西國民之粹」。頤瑣又從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經驗，調來各種可以支撐「黃繡球」的淬鍊方案。黃繡球從解放纏腳、整頓地方風俗、組織民兵、改革鄰村到「繡成一個全地球」的「全球」意識，反映「由己而人」的「擴充」精神：「先從自己的知識擴充，由自己所住一鄉一里的知識，擴而至於外鄉外里；由外鄉外里的知識，又擴而至於我的國度；由我的國度，擴而至於別的國度」，[85]內蘊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作者又旁咨福澤諭吉（1835-1901） 創辦私塾及開創新學風氣的精神，讓她與丈夫批判中國官學，效仿福澤諭吉辦「慶應義塾」開創「女學堂」與「黃氏家塾」，倡導教育救國的理念。此一結合歐美自由理念、傳統儒家倫理、日本教育精神的人物成為國民範本，1907年，新小說社替連載於《新小說》第15號至24號、共26回的《黃繡球》發行30回單行本時，便一連數天於《時報》刊登廣告文案，凸顯「黃繡球」此一小說人物足以成為社會表徵的文詞：「黃繡球即書中主人公，以一鄉僻婦人，力任社會改良事業，歷無限艱難困苦，始底於成，其勇氣耐心及辯才手段，均可爲當世忠士之法」。[86]「黃繡球」此「可爲當世忠士之法」的「鄉僻婦人」乃是經過羅蘭夫人的夢啟、泰西英雄（如噶蘇士、馬丁路得、克林威爾、托爾斯泰）的激勵、傳統儒家倫理的薰陶、福澤諭吉的教育精神，才「始底於成」。小說結尾，頤瑣刻意在鑼鼓喧天的氣氛中替黃繡球加冕：「我黃繡球如今是已經上了舞臺，腳色又極其齊備，一定打一齣好戲，請羅蘭夫人看呢。將來好把羅蘭夫人給我的那本英雄傳上，附上一筆，叫：二十世紀的女豪傑，黃繡球在某年某月出現了。正是：惟有英雄造時勢，直將巾幗愧鬚眉。」[87]在敲鑼打鼓的氛圍中，小說極大化的「對比」架構承載起「鄉僻婦人」變成「女豪傑、英雄、巾幗」的「鑄魂」記。只是，如此的結尾不免反映晚清作者對西方認可的焦慮，黃繡球欲將自己的故事演給羅蘭夫人觀賞以及列入「泰西英雄傳」的心願，隱約道出中國的英雄巾幗有待西方的讚許與肯定。

晚清一批冠之以「新」的擬舊、翻新、續寫作品，恰能反映另一組彰顯「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極大化「對比」。論者已提及晚清「續書」的樣態：「拋開了原著的歷史環境，也撇開了原著的故事情節，只是借用原著中的一些

84 參前註。

85 頤瑣，《黃繡球》，第 2 回，頁 13。

86 轉引徐新韻，〈對《黃繡球》作者頤瑣就是湯寶榮的補證〉，頁 104。

87 頤瑣，《黃繡球》，第 30 回，頁 253。

人名角色，幻設事蹟。」[88]在「拋開、撇開」的「幻設事蹟」中，作者斧底抽薪地將古人置入「美雨歐風頓起沉屙宿疾，發聾振聵造成兒女英雄」的背景，[89]體驗歐風美雨、救亡圖存、物競天擇的思潮。1907年，西冷冬青《新水滸》以風行於晚清的「國民」理念將一批「梁山群盜」淬鍊為「模範公民」。沈松僑曾指出：「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階層的認知框架中，『國民』概念最突出的特質，卻是將所包攝的個人尊嚴、平等與權力等西方（特別是英、美）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立的諸項核心價值。」[90]西冷冬青的續寫動機甚明，欲將「英雄草竊」的草莽、血腥、滯後、野蠻等鑄為「國民」之魂，於是批評《水滸》人物不具「國民」資格：「《水滸》所演的一百另八個人物，其中雖有忠臣，有孝子，有俠義，然究竟英雄草竊算不得完全國民，況且姦夫淫婦，雜出其間，大有礙於社會風俗。」[91]就在「國民」概念席捲晚清小說圈時，[92]西冷冬青將水滸人物置入對比的架構去「邪」歸「正」，從此「以個人自治、合群愛國為主旨」、「獨立自強性質」、「不可再存一點強盜心腸」、「合群愛國」、「從今日起應當勉為立憲國民，各修人格，各盡義務」。[93]作者鑄造一批「想盡自己天職」的「國民」，如吳用發展可培養「女國民」的女學、雷橫從捕頭轉向訓練「國家幹城」的員警、張順振興可以避免洋人壟斷的漁業、張橫打造整頓海軍的鐵甲戰艦，成為二十世紀初的「國民」典範。

從小說技法考量，《新水滸》以鍊條型結構逐一處理各人物的「逼『下』梁山」，線索較多而顯得分疏。同是「下山記」，吳趼人《新石頭記》的視角聚焦於賈寶玉，更能細緻彰顯新舊靈魂的對比性。當吳趼人安排寶玉為「酬我這補天之願」而從「大荒山青梗峰」步入20世紀初光怪陸離的城市時，思考到

88 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270。

89 秋瑾，《精衛石》第五回回目。此小說手稿本見「新浪愛問共享知識」，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332120.html （訪問日期: 2012 年 11 月 28 日）。

90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第 73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687。

91 西冷冬青，《新水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 1 回，頁 183。

92 晚清的發刊主旨、祝詞、編語、小說敘事出現諸多有關「國民」期許的文字，如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指出：「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延陵公子，〈月月小說出版祝詞〉指出：「開通智識之，一助而進國民於立憲資格」。分別見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 14 號（1902 年 8 月），無頁碼；延陵公子，〈月月小說出版祝詞〉，《月月小說》第 1 號（1906 年 10 月），頁 2。

93 西冷冬青，《新水滸》，第 1 回，頁 185、186。

西冷冬青未充分考量的語言、知識藩籬，讓寶玉廢寢忘食地閱讀《時務報》、《知識報》、《清議報》、《電報新編》，又四處探聽譯賣西書的江南製造局與格致書室，猛翻《無師自通英語錄》、《士啤令卜》（Spelling Book）、《英字入門》、《華英字典》等，「上半天看買來的譯本書，下半天讀英文」。[94]如此敘事透露一訊息：來自大荒山青梗峰的「舊民」要在天壤之別的世界取得一席之地，就得在西學猛下功夫，吸納新知，將身上的「古來謬誤」摧陷廓清。從黃繡球、梁山好漢到賈寶玉的「鑄魂」敘事，分享了西方啟蒙理念、女性論述、國民意識、儒家倫理、日本教育精神等「價值綜合體」，差別在於不同的組合、取捨與偏重。以吳趼人而言，全盤西化絕非原則，因而安排做為反面人物的薛蟠也來到上海，醉生夢死地喝著「啤酒、波得、拔蘭地、威士忌」，結交傾洋媚外的朋友，「這種人，不知生的是什麼心肝！照他這等說來，我們古聖人以文、行、忠、信立教的，這『行』字、『忠』字、『信』字都是沒有的了」、「巴不得把外國人認做了老子娘」。作者刻意凸顯薛蟠因缺乏禮教道德而趨炎附勢的個性，先因圖利而諂媚西方，後因貪名而加入義和團盲目排擠西方。薛蟠過猶不及的舉措都非典範，注定無法進入以「天演」為門檻的「文明境界」，誤入冒牌劣質的「野蠻自由」村。對於吳趼人而言，唯有結合西方文明與道德傳統，才能淬礪靈魂，抵達「祥光萬道，瑞氣千條」的「文明境界」。按理而言，陪在寶玉身旁的僕人焙茗應能跟寶玉共進退，可是卻因缺乏西學轉化，抵達「文明境界」前慘遭冷箭射成「一尊木塑的仙童偶像，面目都剝落不堪」，[95]預示了無法與時俱進的中國「舊民」在二十世紀不過是荒陵古墓的殘骸枯骨！吳趼人透過寶玉、焙茗、薛蟠三人的際遇，反映其對「泰東西國民之粹」的旁求，禮教傳統與文明新知缺一不可！

在極大化的「對比」架構中，「強與弱」是另一適合展現「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結構。就晚清文化語境而言，柔弱、靜態、生病的體格常是知識分子批判的對象，如嚴復提倡「操練形骸」與「氣體強健」的「鼓民力」、梁啟超否定傳統以「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的病態體格觀、譚嗣同傾向「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大雄」的「反靜主動論」、蔡鍔與蔣百里等人批判「國力孱弱，生氣銷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墮」而開啟「軍國民」運動，[96]唯有健全體格才能「國富種存」。當「體格」成為一受到關注

94 吳趼人，《新石頭記》，第 12 回，頁 217。

95 同上註，第 7 回，頁 192；第 21 回，頁 279。

96 嚴復，〈原強〉，《嚴復集》第 1 冊，頁 28；梁啟超，《新民說．論尚武》，頁 713；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63；奮翮生，〈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1 月），頁 2。

的選項時，晚清作者將人物置入體操、演習、擊劍、游泳等活動，如報癖〈新舞台鴻雪記〉第二回標題「作楔子表明歷史，興體育初登舞台」，寫「學生們合隊兒上體操場，步法整齊，口令嚴肅，一起一落的運動，覺得很有精神」；[97]陸士諤《新中國》強調「現在體育很是講究，拳棒、游水這兩課，差不多個個學校裡有的。兵式體操，更不必說了」。[98]1905年，陳天華以「過庭」、「星台」之名連載於《民報》的遺稿〈獅子吼〉更以體育、尚武精神等可以強壯體魄的活動實踐振聾發聵的「獅子吼」。該年12月8日，留日的陳天華因日方頒佈鄙視中國人的「取締留學生」規則而呼籲留日學生「堅忍奉公，力學愛國」，但又「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99]選擇在大森海灣投海。陳天華留下遺書〈絕命辭〉：若能讓同胞「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100]當年僅三十的陳天華魂兮離去，其正在《民報》連載的〈獅子吼〉卻孜孜矻矻地透過體育章程、運動會場景、比賽項目、參賽者形象等描寫，展現「強身健體」的敘事，愈讓人欷噓感慨。小說人物設立「聚英館」，「聚英館的尚武精神，又越發振作起來」，「唯有注重體操，練好身體，好為同胞報仇」。無論體育或尚武確可有「強身健體」之效，不過其最終目標卻是為國為族所用，反映時人將「身體」置入「國體」的思維。

在「練好身體」與「尚武精神」的訴求下，陳天華無視於敘事流暢度，洋洋灑灑地在小說中嵌入體操章程，讓人物按表操課，如「本學堂每週（七日為一週）五點鐘體操之外，再加體操五點鐘」、「每年開運動會兩次，嚴定賞罰，以示勸誡。」[101]相比起1903年清政府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體育時數的規定：小學每週訓練三小時，中學兩小時，高等學堂三小時，師範、實業學堂兩小時，[102]〈獅子吼〉主張一週十小時、每年兩次運動會，反映急切的救國心理。此外，作者大肆鋪展「運動會」的場地佈局、座位安排、觀眾入場、比賽項目等，[103]

97 報癖，〈新舞台鴻雪記〉，《月月小說》第 15 號（1908 年 4 月），第 2 回，頁 12。

98 陸士諤，《新中國》，第 3 回，頁 474。

99 劉晴波、彭國興編，《陳天華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 236。

100 同上註。

101 星台，〈獅子吼〉，《民報》第 7 號（1906 年 9 月），第 4 回，頁 16-17。

102 張之洞纂，《奏定學堂章程》，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第 73 輯，頁 276。

103 陳天華先描述運動會的空間佈局：在公園畫出「周圍有了二里多路」的大體操場，圍牆由五色布隔成、四面開門，「門口交插龍旗」，內有帳棚，設有「運動會各項職員的座位」、「左邊一個擺著自鳴鐘、時辰表、呂宋煙、皮靴、緞絹等件」、「右一個陳列軍樂，共有三十多個人」、「其餘兩邊的都是來客的坐席」；作者接而描述

是晚清小說罕見的珍貴紀錄。當然，作者志不在於「運動會」的寫實記錄，卻藉由比賽項目凸顯人物健全的體魄與精神：「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為烘托奮勇英姿的形象，作者聚焦於狄必攘與女鐘兩位角色：「狄必攘」喻示「狄」必「攘」去的民族心理、「女鐘」帶有「女界鐘」之意蘊，反映捍衛民族與宣揚女權的決心。陳天華透過各項比賽放大兩人的矯健身手與勇猛精神，如「過天橋」一項，得「兩手插腰，手不扶梯」登上「高約兩丈」、「削立如壁」的鐵梯，走過「長三餘丈」的天橋，「少有不膽戰心驚的」，狄必攘卻「飛身而上，仍飛身而下，面色不改」。人物敏捷的身手與過人的膽識一再被凸顯，如「把兩根竹竿牽一條繩子，約有八尺多高，必攘一躍而過」，必攘與「約高六尺，兩臂如碗粗」的彪形大漢比賽相撲時「賣個虛勢，把他的左足一勾，早已仆地」，又以「鐵面具蓋面，兩膀及兩脇緊縛竹片」「兩兩對擊，不及數合，那人又敗下去。」從過天橋、跳高、相撲到擊劍等項目，「惟有必攘，超群拔萃」。巾幗不讓鬚眉！女鐘在「競馬」項目挑戰風靡全場的狄必攘，「手不扶馬，縱身一躍」，「將鞭一揮，那馬電閃一般」奔馳，在如虹的氣勢中展現嫻熟的御馬術。狄必攘與女鐘馳騁全場、並駕齊驅的身影，「神色不變」、「氣不亂喘」，[104]在在彰顯「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大雄」的體魄。經由運動會場景與比賽項目的剪裁與刻畫，作者確立起人物英勇慓悍、銳不可擋的身體，扭轉「國力孱弱，生氣銷沉，扶之不能止其顛，扃之不能止其墮」的病體。運動會結尾處軍樂大作、煙火燃亮，天空出現「黃人世界」的金字，再旁襯觀眾如雷的喝采，構成「強健體魄」實踐「黃人世界」的殷殷期許。

從《黃繡球》的鑼鼓喧天到〈獅子吼〉的絢爛煙火，都可見到晚清作者鏗鏘有力地形塑「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渲染「國旗翻翻，黃龍飛舞」的氣氛，反映集體的「加冕無意識」。相形之下，1909年，筆名「冷血」的知名報人陳景韓（1878—1965），[105]在他與包天笑（1876-1973）合編的《小說時

觀看者：「先期買了入場票」可入座，「沒買票的，抵可在站圍外」；作者又描寫各學堂學生、觀眾入場，軍樂大作，比賽流程為「先習徒手體操，後習兵士體操。器械體操，危險體操，相繼並習。下午競走，由十人一排競走，以致超越障礙物件。競走、相撲、擊劍各事，都以（依）次並作。」星台，〈獅子吼〉，第 4 回，頁 17、18。

104 星台，〈獅子吼〉，第 4 回，頁 18、19、20。

105 關於陳景韓的筆名有冷血、冷、新中國之廢物等，曾任《申報》、《時報》、《小說時報》等主筆或主編。見湯哲聲，〈時評催人醒冷血心腸熱—陳冷血評傳〉，收入范伯群主編，《演述江湖幫會秘史的說書人》（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頁 184-185；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頁 488-491。

報》創刊號發表的〈催醒術〉，抽離「加冕」氣氛，反而彰顯覺醒後的痛苦、掙扎、徬徨，可視為「淬魂鍊體」的變調版。冷血如一般晚清作者無忌於「概念先行」的技術問題，在小說開場處便揭露自己的創作動機：「冷曰：『世傳催眠術，我談催醒術。催眠，科學所許也。催醒術，亦科學所許也。催眠術為心理上一種之作用，催醒術亦為心理上一種之作用。中國人之能眠也，久矣，復安用催所宜。』」冷血將自己的小說置於缺乏「發刊詞」的創刊號第一篇，隱約點出刊物的「催醒」主旨。「催醒術」可使「伏者起、立者肅、走者疾、言者清」、「若飲劇藥、若觸電氣」、「於其體魄中與之精神力量」。冷血讓第一人稱敘事者「予」經歷文學傳統的「遇仙記」，偶遇「衣常人衣服，常人服所有一切，悉視常人」的手持竹梢者。經對方竹梢一指，七孔開竅、茅塞頓開，「予若易予筋，換予官，予若成另一予」，「予」成為「口鼻手足無一不豁然」的「心明、眼亮、耳聰」者。[106]

冷血安排「予」從「睡」轉「醒」的「催醒術」，不讓人意外，回應頤瑣、西冷冬青、吳趼人、陳天華等人的「舊女性→新女性」、「古人→今人」、「弱體→強體」的敘事。不過，冷血逸出「淬魂鍊體」後的「加冕無意識」，開啟「眾人皆睡我獨醒」的衝突、掙扎、困惑、吶喊、徬徨心理，被迫進入一系列棲棲遑遑的「對抗」循環。「予」先察覺到自己的臉、髮、衣服與室內桌椅、窗櫺等遍佈塵垢，「急取水、急取拂拭具」，來訪的客人群卻是「客帽積塵，客面積垢，客衣服積穢」，「予」又「取水取盥洗具取櫛取刷」，因分身乏術而請僕人幫忙，卻發現僕人比客人更多污垢，又呼喚他僕。冷血刻意將「予」置入滑稽的悲劇結構，一層層放大「予」與「群眾」的衝突，安排「予」從室內來到室外，發現巷落病婦撫孩哭泣、毒母虐打少女，又走入「蠅聲哄哄然」、「死鼠棄路側」、「蛆自其口出」的衛弄。最後，「予」進入飯肆，群蠅「擾擾競趨飯菜間」、蚊、虱、臭蟲、飛蟻「擾予身，吮予血」，客人卻無動於衷。從室內到室外的移動，冷血無疑是要彰顯「心明、眼亮、耳聰」的覺醒者對比於「若無耳目口鼻」、「無手足身體皮膚之感覺者」的群眾，引發往後被魯迅稱為「獨異個人」與「庸眾」的對峙：眾人因「昏睡」而察覺不到覺醒者的憂患，替「予」貼上「狂」的標籤：「彼殆病神經」、「群笑予為狂」。[107]范伯群率先指出〈催醒術〉可視為〈狂人日記〉的譜系，「表明了陳景韓的思想站在時代的前列。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狂人世家』是有一個發展譜系的」、

106 冷血，〈催醒術〉，《小說時報》第 1 期（1909 年 10 月），頁 1。
107 同上註，頁 2、3、4。

「用象徵的手法，寫出當時先進分子覺醒後的孤軍奮戰與內心苦悶」。[108]若是放在晚清小說的脈絡，又可探測該小說的另一層意義。無論晚清作者如何調動虛虛實實的鑄魂「價值綜合體」，卻殊途同歸，反映「國族化」的靈魂，使得「鑄魂」後的人物在加冕氣氛中陷入群體意識的「國家」枷鎖，尚未能拓展出更強烈的個人意識。[109]在高亢的改革熱潮中，冷血反向操作，以冷峻犀利的眼光抽離集體的「加冕」氣氛，探及「予」鑄魂後的困惑、徬徨，提前叩問改革熱情退卻後才會出現的問題：在麻木群眾中，個人「覺醒」又怎樣？此解構「覺醒神話」的視野替晚清的「加冕」氣氛做出變調，從鑼鼓喧天、普天同慶變為孤獨徬徨、惶惶不安，雖未能跟外在的體制群體對抗，可是卻已稍能從群體意識脫綁，以犀利的角度反思覺醒後的個體的遭遇。

由上可見，晚清作者群「旁求泰東西國民之粹」，從近現代興起的理念思潮，如國民、自由、權利、尚武、體育與文化傳統，製造／化分／鑄／旁求「淬魂鍊體」的「價值綜合體」。小說以極大化「對比」架構如「新與舊」、「古與今」、「強與弱」、「睡與醒」等，凸顯新舊魂體的差別，放大價值差序，構成「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

五、結語

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近現代小說的轉軌與發展。從上述的身體時局、病體治療、淬魂鍊體等討論，可見晚清小說已拓展出往後被魯迅發揚光大的題材，如以昏睡「身體」投射「國體」際遇，牽引出五四的國民性批判；「回春妙手，救國良醫」與「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恰是五四文學診斷民族痼疾的先聲。以具體小說而言，徐念慈〈情天債〉「荒原」的昏睡者與魯迅「鐵屋子」的昏睡者，投射「萬難逃出」的國族命運；〈催醒術〉更可視為〈狂人日記〉的先聲，彰顯庸眾與獨異個人的對峙以及隨而引

108 范伯群，〈《催醒術》：1909 年發表的「狂人日記」——兼談「名報人」陳景韓在早期啟蒙時段的文學成就〉，《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1、5。

109 此情形如同沈松僑對於晚清「國民」的研究：時人對「國民」此一「以人身權利為內涵為法定的身分」的論述始終無法擺脫「國家」巨靈的籠罩，只能是達成「救亡圖存」之國族主義企劃的手段，而無法確立為一個自主的普遍性範疇，「晚清國民論述鼓吹自由、民權、平等、自主等源自西方自由主義的觀念與價值，其命意所在，卻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的原有脈絡完全相反。」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718-719。

發的「瘋狂」標籤。就文學史演進而言，早於魯迅，晚清作者群已在小說敘事中拓展身體／國體想像，理應受到更多矚目。

晚清作者結合文學想像、器物發明、醫學論述、家國際遇等，開拓了『身體／國體』的視角。首先，各作者以潰爛、斷裂、崩倒、鬼魅化等形象性的身體意象將頹喪的國勢援引入「身體」，掀開一幅幅隱藏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話語的「身體時局圖」。小說中的吞噬、昏迷、倦怠、癱瘓、抽搐等「身體」情狀無不渲染近代中國在「進化」話語下的「弱肉強食」觀，承擔「智與愚」、「強與弱」、「進步與落後」等以國力為依據的價值差序。相較於議論性的文章，小說文體的敘事元素可以營造或渲染各種身體意象，作者透過各種文字排列、意象經營、人物形象、情節塑造等，使得「身體」成為一無盡延展的空間，折射羸弱、衰敗、阻礙、陰暗、死亡、落後的印象，反映四分五裂、分崩離析、積弱不振的國體。

固然，「進化論」引發亡國滅種的危機，可是也激勵「進者存而傳焉」、「進者日昌」的決心。若不革新圖強、自強保種，如何爭得民族生存權利？具有「改造」之喻的「醫病」想像與「魂體」改造論恰逢其時，成為時人診斷、治療、陶鑄身體的視角務必讓「病體中國」脫胎換骨。就「小說診斷學」而言，作者紛紛將「病體中國」推到手術床，以各種器物發明如透光鏡、驗腦機、解剖刀等檢驗解剖「身體」，實踐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敘事；就「魂體對比法」而言，晚清小說作者群「旁求泰東西國民之粹」，透過一系列極大化的「對比」架構，如「新與舊」、「古與今」、「強與弱」、「睡與醒」，凸顯新舊魂體的差別，構成「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國族」魂。

上述由身體時局圖、小說診斷學、魂體比對法共構的討論脈絡，反映晚清作者群透過文學想像與敘事元素將各種看似生理存在的「身體」引入近代崛起的「國體」規訓。約翰・奧尼爾（John O' Neill）曾說：「我們的身體是所有社會行為可以滲透的基礎，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人類將世界和社會視為為一個龐大的身體。因而，身體的組織推衍世界和社會、人類與動物的組織。」[110]晚清各作者「將世界和社會構想為一個巨大的身體」，使得各種肉身形體、魂魄精神承載起近代「國體」的際遇，推衍時勢變遷與未來期許。這些結合科學、醫學、政治、文學的敘述開啟豐富的「身體」圖像，遂使以新民／國／文化／宗教／道德為職志的「新小說」不只做為「街談巷議」的「小道」，反映時人有意為之的「大說」功能。

110 John O' Neill,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6), 22-23, 2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石臞山民，〈新乾坤〉，《月月小說》第20號，1908年。

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

清・西冷冬青，《新水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清・佚名，〈招國魂：哀軍人之不振也〉，《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5月。

清・佚名，〈憲之魂〉，林辰、段文桂主編，《梟鬼雄魂記》，瀋陽：遼沈書社，1992年。

清・冷血，〈催醒術〉，《小說時報》第1期，1909年。

清・吳趼人，《新石頭記》，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還我魂靈記〉，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

清・壯遊，〈國民新靈魂〉，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

清・延陵公子，〈月月小說出版祝詞〉，《月月小說》第1號，1906年。

清・東海覺我，〈情天債〉，《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

清・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

清・星台，〈獅子吼〉，《民報》第7號，東京：民報社，1906年。

清・臥虎浪士，《女媧石・序》，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春颿，《未來世界》，《月月小說》第24號，1909年。

清・過庭，〈獅子吼〉，《民報》第2號，1905年。

清・秋瑾，《精衛石》，「新浪愛問共享知識」，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332120.html，2012年11月28日。

清・海天獨嘯子，《女媧石》，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清・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高陽氏不才子，《電世界》，《小說時報》第1期，1909年。

清・珠海夢餘生，〈粵謳新解心五章・黃種病〉，《新小說》第2卷第4期，1905年。

清・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第1期，1903年。

清・張之洞纂，《奏定學堂章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3輯，臺北縣：文海出版社，年代不詳。

清・張坤德譯，〈中國實情〉，《時務報》第10冊，上海：時務報社，1896年。

————，〈天下四病人〉，《時務報》第14冊，上海：時務報社，1896年。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號，1902年。

————，〈新中國未來記〉，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清・陸士諤，《新野叟曝言》，上海：上海改良小說社，1909年。

————，《新中國》，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報癖，〈新舞台鴻雪記〉，《月月小說》第15號，1908年。

清・湯頤瑣，〈附徐仲可先生天蘇閣娛晚圖序〉，《純飛館詞》，《叢書集成續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清・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號，1902年。

清・陳天華，劉晴波、彭國興編，《陳天華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清・劉鶚，《老殘遊記》，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清・康有為，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台北市：宏業書局，1976年。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清・奮翮生，〈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

清・蕭然鬱生，〈烏託邦游記〉，《月月小說》第2號 ，1906年。

清・頤瑣，《黃繡球》，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有限

公司，1984年。

清・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清・嚴復，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清・覺我，〈小說林緣起〉，《小說林》第1期，1907年。

二、近人論著

丁福保編，《佛教大辭典》，《佛學工具書集成》第32冊，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9年。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朱莉婭・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著，張新木譯，《恐怖的權力——論卑賤》，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第2卷第3期，1991年。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2002年。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

祝平一，〈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第7卷第2期，1996年。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胡纓，〈羅蘭夫人及其中國姐妹〉，《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范伯群，〈《催醒術》：1909年發表的「狂人日記」——兼談「名報人」陳景韓在早期啟蒙時段的文學成就〉，《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5期，2004年。

時萌，《晚清小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

郭長海，〈《黃繡球》的作者頤瑣考〉，《社會科學戰線》第64期，1993年。

徐新韻，〈對《黃繡球》作者頤瑣就是湯寶榮的補證〉，《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張寧，〈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湯哲聲，〈時評催人醒冷血心腸熱——陳冷血評傳〉，范伯群主編，《演述江湖幫會秘史的說書人》，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

黃金麟，〈軍國民、新民與公民的身體——身體的國家化生成〉，《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店，1975年。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

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

鄧鐵濤、程之範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

維拉・伯蘭特著，方維貴譯，〈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葉舒憲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魏紹昌編，《老殘遊記資料》，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

劉紀蕙，《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年。

劉德隆等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魯道夫（Rudolf G. Wagner），〈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

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嚴芙聲等，〈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

Baldick, Chri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co, Umberto. *On Ugliness*. New York: Rizzoli, 2007.

Freeman, David L. & Abrams, Judith Z. *Illness and Health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Writing from the Bible to Toda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9.

Hawthorn, Jeremy.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4.

Hodgkiss, Andrew. *From Lesion to Metaphor: Chronic Pain in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Medical Writing, 1800-1914*.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v Editions, 2000.

Nordau, Max. *Degener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O' Neill, John.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6

Turner, Bryan S.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6.

Vaisrub, Samuel. *Medicine's Metaphors: Messages & Menaces*. New Jersey: Medical Economics Company Oradell, 1977.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7.

The Images of “Body” and “Nation” in Late-Qing Fiction

Guan, Kean-fung*

Abstract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corresponding pattern of “body” and “nation” in late-Qing fiction. Firstly, by examining the scheme of the body’s split and dehumaniz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late-Qing writers made use of this kind of scheme to reflect their though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empire, which was compared to an exhausted and ill “human body.” Secondly, it points out that before the May Forth writers made use of “medical” narrative, late-Qing writers had already used it to manifest their patriotic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form. Methods of comparison between an ill body and the descending nation were commonly used. By producing the imagery of an ill body undergoing medical treatment or surgery, late-Qing writers projected their expectation of a promising nation after reform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analyses how late-Qing fiction showed forth a narrative mode of “construction of spirit” by making use of a distinct technique of contrast. This technique represents late-Qing people’s eagerness for a new national and eethnic spirit.

Keywords: body, nation, ill and cure, fiction, late Q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